

# 问题与突破：新媒体技术逻辑下 媒介体制研究的再审视

刘娟

**摘要：**媒介体制的日益多元化，使得不同传播形式重叠，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逻辑、传统、利益观和价值观，从而对媒介体制研究的分析提出新要求。回顾既有媒介体制研究，因其缺乏动态调适性，忽略新变量带来的整体性意义，以简单模式抹杀媒介体制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不足以解释新媒体技术和全球化等新参数带来的新问题，在此基础上需要重新审视既有媒介体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结合新参数带来的新问题，从整体性语境和研究本质出发，进行时空纵横的结合和既有研究范式的融合，借助有效的理论和方法资源去除既有研究路径依赖，厘清媒介体制的因果关系、文化内核和意义之网，从而突破既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关键词：**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媒介体制；技术逻辑

**作者简介：**刘娟，女，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8）06-0028-07

传媒语境的变迁和传播模式的发展，使得各国媒介体制的核心——媒介机构本身及其功能，以及从事新闻生产的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和任务，发生颠覆性变革。以此纵观全球，不同国家的媒介体制研究需要处理不同的核心议题，在此新背景下，新媒体技术和全球化作为影响媒介体制研究的主要新变量介入既有媒介体制研究中，使得既有媒介体制研究路径和范式缺陷愈加明显，因此有必要对既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反思。

## 一、既有研究路径中的不足和新问题

### （一）对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的再审视

在一般意义上，“体制”代表了社会学中的“结构”及其稳定关联所形成的结构，以及这种关联所遵循的原则和规范，制度是体制的核心。<sup>[1]</sup>丹尼斯·麦奎尔认为：“传媒制度是一切与传媒领域相关的制度，具体而言，媒介体制是指嵌入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和规则。”<sup>[2]</sup>

在梳理从20世纪40年代发展至今的媒介体制研究现状、价值底色和逻辑架构过程中，会遭遇两种看似相反实际暗通的研究路径。一种是以《报刊的四种理论》为代表的规范性研究，1956年施拉姆、希伯特和彼得森三位学者总结归纳出四种传媒体制类型：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和集权主义模式，开创媒介体制研究的源头，积淀基本研究范本。三位学者以哲学为基底的方式，把媒介体制纳入抽象且普遍的“既定权力关系和利益结构”中，赋予传媒所置身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色彩，用西方标尺衡量充满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媒介体制现实，从而体现出一种理想化的媒介体制模式：自由主义西方模式。另一种是以超越规范性研究为前提的经验性研究，以哈林和曼奇尼合著的《比较媒介体制》为典型代表，用四种维度：媒介市场的发展、政治平行性、国家干预、新闻专业主义，论述18个国家媒介体制的复杂性，总结和归纳出三种模式：大西洋与自由主义模式、地中海与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北欧中欧与民主法团主义模式，<sup>[3]</sup>从理论选择到经验数据的收集，再到逻辑框架的设计，试图超越规范性

研究路径中的不足，最终却没能脱离规范性研究的藩篱。

规范性研究从《报刊的四种理论》奠定媒介体制研究的框架伊始，认为哲学和政治制度是影响和决定媒介体制的必然因素，给出四种普遍性模式，无视“普遍性”价值体系（此普遍性下暗含着西方的优越性和理想性）中隐藏的历史局限性、思想局限性和利益特殊性，忽视自现代性以来，各国社会变革、制度建设、技术发展和经济建设等诸多因变量给媒介体制带来的整体意义。所以从规范模式出发的研究，以西方媒介体制模式为标准来审视其他国家，无法看到世界历史范围内其他国家媒介体制的多样性。

经验性路径虽承认多样性和丰富性，却在大量数据中掩盖了媒介体制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拥有诸多数据，扎实的经验事实，将研究扩展到更大范围，但仍停留在规范性研究框架内，并未超出规范性研究的基本视域，在理论上默认规范性研究提供的基本原则，例如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框架，本质上是对规范性研究的修补。在经验数据获取的基础上，给出比较和分类维度，然后将不同国家的媒介体制纳入其中，总结为几大模式，把复杂多样的媒介体制特征和要素简化为四大特征，忽视“西方与其他国家媒介体制”维度之间的断裂和重组后带来的矛盾，“忽视国家内部的差异性和异质性，忽视媒介体制和社会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只局限于不同媒介体制之间的联系和强调政治因素的影响，忽视媒介体制的不确定性和暂时稳定性，存在解释范畴和视野不当问题，例如缺乏对国家内部、区域性和全球范畴内媒介体制的考量，忽视历史、文化、社会传统对媒介体制的影响。”<sup>[4]</sup>

## （二）后续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以《报刊的四种理论》为基础产生大量规范性研究，以《比较媒介体制》为基础产生大量经验性研究，虽在研究方法上延续既有路径，但学者们仍致力于扩展研究框架以更加全面阐释媒介体制现状，在原始框架的基础上增加新内容。1981年哈克滕（Hachten）增加了媒介变革性概念，在分析苏联解体后国际媒体格局的基础上认为媒介体制的改变引起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变迁<sup>[5]</sup>；1987年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提出两种新的媒介体制理论：民主参与理论（democratic participant theories，受众平等使用，服务于受众利益而非组织和政治目的）和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ies，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介体系服务于发展目标），认为媒介体制是政治经济权力的代理机构，其内容生产反映了政治经济结构<sup>[6]</sup>；1988年斯帕克斯（Sparks）和斯皮里乔尔（Splichal）提出媒介体制的两种基础分类：商业化和家长制（paternalist），认为后者囊括了国家和精英对媒介控制的媒介体制类型<sup>[7]</sup>。此外，媒介体制的分类维度也有所扩展，2005年布鲁姆（Blum）在完善2004年哈林和曼奇尼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将文化特点作为分析媒介体制变量的新维度，增加了新闻自由、媒体所有权、媒体文化、媒体财政收入、媒体导向、政治文化等变量，在此基础上囊括了更多国家在内，提出自由模型（大西洋—太平洋的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共服务模型（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北欧国家）、爱国主义模型（阿拉伯国家）、命令式模型（亚洲—加勒比，包括朝鲜、古巴、越南等），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特定的国家被划入某一特定类型。<sup>[8]</sup>

新近研究范畴可划分为：第一，研究个别国家媒介体制，例如海德薇格·德·斯迈勒（Hedwig de Smaele）的《俄罗斯媒介体制的界定》，认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媒介体制不是马克思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模式或共产主义模式，而是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t）模式，仍由国家控制但缺乏一致性，显性审查去除，隐性控制仍在，兼具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特征，西方商业新闻生产模式的借鉴和公共服务模式共存；<sup>①</sup>第二，在民族国家单位内研究媒介体制与政治经济等变量的关系，艾德里安·哈德兰（A-

<sup>①</sup> De Smaele H. In search for a label for the Russian media system. (Paper presented to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West meets East symposium, Wrocław, Kliczkow Castle, 23-25 April 2007)

drian Hadland) 在《南方视野下：变革的动因与迹象》一文中认为媒介体制变迁独立于政治经济；<sup>①</sup> 第三，分析媒介体制对媒介信息内容生产的影响，沃尔克·尤斯 (Volkan Uce) 和昆蒂·德·斯维尔德 (Kunt De Swert) 《从媒介体制的三种模式分析土耳其媒介体制》，以哈林和曼奇尼提出的媒介体制变量来分析土耳其的媒介体制如何影响政治信息的传播和生产；<sup>[9]</sup> 第四，比较个别国家的具体媒介体制的改革，例如卡莱斯·莱奥朗 (Carles Liorens) 和伊莎贝尔·费尔南德斯·阿朗索 (Isabel Fernandez Alonso) 的《比较视野下的英国和西班牙公共广播电视媒介体制改革 (2004-2007)》，分析西班牙和英国公共广播电视媒介体制改革差异。<sup>[10]</sup>

2007年托马斯 (Thomass) 将50年的媒介体制研究总结如下<sup>[10]</sup>：

(1) 比较媒介体制研究长期局限于以学者所在的社会和哲学基础为背景来衡量和分析其他国家的媒介体制，忽视此思想基础与媒介体制之间的差异和鸿沟；

(2) 媒介体制的研究和类型分类方法从规范性研究向经验性研究转变，整体上对媒介体制类别的分类数目略有增长；

(3) 将政治体制作为特定分析背景环境的研究增多；

(4) 基础理论反映了社会科学和传播研究的理论成果；

(5) 对媒介体制的分类模式过于静态，难以反映出媒介体制和媒介实践的变化；

(6) 互联网技术对媒介体制的影响至今尚未被系统分析，但比较媒介体制对于全球化而言，仍是理解和认识全球化的重要维度和途径。即使有从互联网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也只停留在分析媒介体制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内容生产模式的影响层面，例如《比较媒介体制和媒介内容：十个东欧和西欧国家的网络报纸分析》，借助哈林和曼奇尼对媒介体制的分类，从报道类型相似性、新闻的垂直欧化和水平欧化三个维度分析11个欧洲国家网络内容与媒介体制之间的关系。<sup>[11]</sup>

随着传媒产业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著名传播学者达拉斯·斯麦兹 (Dallas W·Smythe) 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开始关注媒介体制的中观层面——媒介所有权、控制模式、产品生产和分配关系，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理和规范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无论是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的批评研究，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介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静态分析研究，并没有对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机制进行深入分析”<sup>[12]</sup>，缺乏动态变迁进程研究，缺乏新媒体技术维度和跨国媒体对媒介体制影响的考量。

### (三) 新参数带来的新问题

新媒体技术逻辑下，需要重新阐释新媒体技术和跨国媒体合作给媒介体制研究带来的影响，2003年黄成举 (Chengju Huang) 呼吁更新媒介体制研究方法，提出“规范性媒介体制研究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缺乏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自动调适能力”，不能再停留于对复杂且动态的媒介体制现实进行简单分类的层面上<sup>[13]</sup>；2006年古斯塔沃·卡多佐 (Gustavo Cardoso) 认为：“媒介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太新，它们将如何影响媒介体制和全球传播空间，尚未定论，将其纳入媒介体制研究存在很大难度。”<sup>[14]</sup> 2007年托马斯提出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媒介体制的影响至今尚未被考量，认为媒介体制研究应该走向动态分析，去除对学者哈林和曼奇尼的路径依赖，“不仅研究媒介体制已是如此，更要研究媒介体制去往何处”<sup>[15]</sup>。以此，媒介体制研究应该去除既有研究路径依赖，将媒介体制视为人类传播变迁历史中不断转变、调适的过程，将其视为一个随着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动态体系，相较于静态分类，动态的变迁更应该被纳入分析范畴；将媒介体制变迁视为一个包括缓慢变革和

① Hadland, A. A perspective from the South: triggers and signs of change. (Paper presented to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West meets East symposium, Wroclaw, Kliczkow Castle, 23-25 April 2007)

彻底改革的历史进程，保持文化开放思维，从文化、历史视野对媒介体制动态和静态进行分析，而非从单一的哲学或者意识形态维度进行分析。哈林和曼奇尼的分析方法十分有限，特别强调对政治因素的考量，很少关心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全球化变量，并且模式与现实之间存在严重脱节，需要将既有的研究和分析扩展到新的领域。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不能再继续作为媒介体制分析的唯一基础，超越民族国家或者深入民族国家内部的分析也需要考虑<sup>[4]</sup>；将超越和国家内部视野考虑进去，将新媒体技术和新的传播模式考虑进去，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影响媒介体制的根本性变量结合起来，注重媒介体制转向和变迁研究。<sup>[10]</sup>

## 二、新媒体技术逻辑下如何进行媒介体制研究

### （一）回应内在性问题和提出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坚守本质

新技术逻辑下，制度变迁和范式转型成为当前各国媒介体制变迁的基本取向，新旧媒体之间，国内外媒体之间矛盾丛生，冲突不断，贯穿其中的价值理念、体制框架、政策行为、技术基础等构成一幅多重复合，既充满前进动力，又进退维谷的传媒图景。在此背景下，媒介体制的研究问题应该有所更新，不再局限于起始状态的研究，在新媒体技术逻辑下，需要在本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诸如：媒介体制发生怎样的变迁？导致变迁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这些动力因素包括哪些？是外生动力为主，还是内生动力为主？是技术推动，还是利益博弈？变迁的轨迹是否有规律可循？这些变迁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sup>[12]</sup>上述问题是媒介体制研究需要把握的本质性问题，因此需将这些本质问题纳入对媒介体制变化过程进行总体性大跨度的准确描述中，纳入对媒介体制变迁的历史、场景进行解码和注释中，并在深度考察和历史图景式研究的基础上给出理论解释，<sup>[16]</sup>提出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和媒介体制动态变迁模式。

多种力量博弈使得媒介体制的变迁过程充满变数，针对充满变数的媒介体制，需仔细研究其内部肌理和内在变迁逻辑，既有的直观式解读，对变数的描述性总结，缺乏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虽有学者通过对报业、广播电视等体制变迁的观察，进行精确的描述和总结，但将变迁的动力机制总结为经济利益驱动、政治决定论，而无法深入媒介技术自身的演变规律，忽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从而也忽视体制形成以及变迁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和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托马斯2007年提出的“媒介体制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sup>[10]</sup>。因此需在动态变迁分析过程中提出有解释力和有时间效度的分析框架。对于动态博弈的张力分析，需要从分析框架上进行完善，引入经济社会学理论、新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等多学科的框架和多视野的范式，从历史的视角和多元逻辑入手，才能准确梳理出媒介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和深层逻辑。<sup>[17]</sup>

具体到媒介体制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回答以下问题：在不同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与政治体制下，媒介缘何会形成特定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的条件下媒介如何、为何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不同类型的传媒之间如何进行关联并彼此影响；媒介体制如何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相较于静态的描述性研究，媒介体制的动态比较研究方法更具有意义。<sup>[18]</sup>

### （二）借助其他理论资源和方法，进行融合性研究——去除路径依赖

自《报刊的四种理论》开启媒介体制研究范式之后，后续研究一直存在着对既有研究的路径依赖，<sup>[10]</sup>借助政治学等理论来源，与其他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进一步融合，扩大理论资源和方法来源，去除媒介体制研究对既有研究路径的依赖，例如对统计学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的借用。比较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各有缺陷，结合使用，取其精华去其缺陷，从而充分发挥不同方法的内在优势。借助个案研究提供的丰富经验材料，借助其他理论来源和理论框架，通过系统收集和分析经验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性经验研究基础上，实现理论的凝结和升华。

此外,有必要推动既有研究范式和路径的互动融合。在全球化技术和价值领域的“世界大战”背景下,把媒介体制研究框限于政治与经济分野的逻辑下,把彼此之间的差异总结为“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的往复归纳和简单更新,容易陷入简单化逻辑中。有必要超越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路径,尤其是比较研究范式,因其停留在大量经验性数据归纳总结的层面而陷入简单化困境。因此需要加入全球化视野、现代性维度、技术的考量,挖掘这些因素之间相互的关系网,探讨此关系网与媒介体制变迁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从而在对具体的和特殊的经验数据综合分析中归纳总结出规范性理论,将量化数据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实现规范研究和经验性研究的杂糅,解决比较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兼容性问题,实现两者真正的互动融合,致力于当代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的技术、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结构分析,以期从中找到媒介体制研究的批判性的、积极且客观的分析。

如何实现融合,尤其是在全球化视野下,此关乎研究基点的问题。要跳出西方模式和民族国家模式,扩大研究的理论和经验视野,寻找新的研究范畴。在新媒体技术逻辑的冲击下,需要加入:对新媒体媒介体制和传统媒介体制的比较分析,全球媒介公司下的跨国媒介体制之间的对比分析,探析全球化的力量和新媒体技术是否会驱使媒介体制走向同质化,分析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对媒介体制的本质性影响。学者李金铨针对国际传播研究提出的“在地经验,全球视野”逻辑可以借用,<sup>[19]</sup>媒介技术的全球化发展,使得媒介体制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同时又扎根本土经验,从活生生的在地媒介体制现实和经验数据开始,借助规范性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概念、逻辑和理论框架,实现“因果关系”“纵横相关关系”和“意义充分性”的结合,一方面理解媒介体制形成和变迁的前因后果,另一方面阐明媒介体制现实丰富又复杂的理论意义,在历史架构内追溯具体之因和意义之网,同时借助格尔兹的深描法,在比较个案研究中刻画、剥解层层意义,烘托出各种社会形态、结构、过程、动机与互动关系。规范性研究提供理论,而经验性研究则深入具体的媒介体制现象,将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结合,才能真正全面反映媒介体制研究的旨趣所在。

### (三) 从社会系统出发,了解传媒体制赖以生存的整体意义语境——增补语境空缺

“媒介体制是历史的产物,反映着一国的宗教、文化、生活和社会状况”<sup>[4]</sup>,任何一种媒介体制都不是静态存在,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时性地发生着改变。要想全面了解各种传媒体制之间的差异,做出有意义的比较分析,就必须考察传媒赖以运行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社会系统、历史语境、文化体制,并寻找这些要素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因此媒介体制研究需要综合媒介体制坐落的历史语境后,选择合理的研究变量和维度,来建立更为系统和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

与传统文化等历史语境相比,全球化、现代性和新媒体技术构成了媒介体制研究的当下社会语境。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需要了解媒介体制出现新的样态,一方面是技术更新层面,即新旧媒体体制之间的变迁和关系,在何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环境中变革,变革的原因是什么,造成怎样的影响,变迁状态存在怎样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带来的新影响,或深入民族国家内部进行深描,弥补既有研究中对民族国家内媒介体制系统的具体分析的不足,或超越民族国家的分析视野,分析区域性媒介体制的形成和动态变迁,从整体性和总体性层面分析全球化趋势对媒介体制的影响。媒介体制的当下语境作为整个社会结构组成部分和媒介实践活动新变化的表征,因此需要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或哲学角度整体性地梳理出新的变数,分析新的媒介体制变迁因素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媒介体制的历史性、社会性和差异性,尤其是对媒介体制中呈现的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次分析。

除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的烛照之外,还要关照媒介体制坐落的意义语境,深入挖掘不同社会形态下各国对传媒功能的基本假设和信念,以此了解传媒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真正关系。但此并非要将文化

传统、利益价值和意识形态色彩高高凌驾于媒介体制之上，完成决定论的再论证，而是要深入了解媒介体制差异的本质原因，为什么各国会呈现出不同的传媒体制变迁轨迹，为什么会导导致今天这种多样化、差异化的媒介体制现状。不仅要指向媒介体制与各种价值预设、理念铺垫、意识形态色彩层面，更要深入了解媒介结构与社会系统之间互动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的历时性、经验性的分析。

#### （四）从新参数出发，动静结合中深描媒介体制动态变迁的图景——注重动态变迁

无论是《报刊的四种理论》还是《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给出的模式，现存的分类模式在时间轴上移动后就逐渐呈现出不适用的特点，这种历史维度和历时层面的不适用性与既有研究模式和理论的局限性相对应，因此需要在分析的维度中，纳入历时性视野，避免“媒介体制的不确定性和暂时稳定性，存在解释范畴和视野不当问题，忽视国家内部、区域性和全球范畴”问题。<sup>[4]</sup>

在新媒体技术和全球化视野下，资本全球流动、市场逻辑全球繁殖、技术全球扩散、时空全球压缩，各国的媒介组织形式和功能定位发生多层次、全方位的历史性转型。<sup>[20]</sup>融合新闻、多媒体技术、多元文化，使得不同国家需要重新定位媒体角色和组织模式，新旧媒体技术之间的竞争逻辑和跨国媒体公司全球定位以及互联网的全球发展，与媒介技术转型和产业转型相适应，各国媒介体制纷纷经历着最为深刻的结构转型。<sup>[12]</sup>因此媒介体制研究除了传统的路径，还需要纳入新时空因素和新媒体技术逻辑的考量，需要进行不同国家媒介体制的比较。在对不同时间点上的媒介体制进行比较（静态的横向研究）外，还要有历时性的动态媒介体制研究，实现空间层面（全球视野）和时间层面（历史视野）的结合，以此才能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分析新媒体技术逻辑下的媒介体制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差异性。

在空间层面，确定合理的比较范围，实现个案的丰富性、差异性与模式的普适性和概括性之间的平衡。同时，因媒介体制的比较研究，不以共性总结和模式归纳为终极目的，不是普遍化、一般性的研究，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而偏差个案作为问题的一个面相，即使偏离的个案会削弱假设的合法性，甚至证伪假设，也需思考偏差个案的意义。<sup>[21]</sup>此外，如何对不同地区的国家进行分类，尤其是如何对兼具诸多相似性特征的中间灰色地带的分类，如何对变量和要素进行合理性选择都是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影响媒介体制的因素和变量很多，例如政治模式、市场规模、媒体集中化程度、新闻自由度、种族与语言结构、意识形态与文化模式、习俗传统、法律惯例等，因此面对诸多变量和要素，要确定关键性变量和要素，把媒介体制的比较分析集中在可比性（可比性指的是诸多重要变量之间的相似性）的案例上和关键变量上，对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区域性媒介体制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现实进行考虑。

在时间层面，将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进行结合。在动态层面上，对媒介体制变迁的不同阶段、特点、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媒介体制的范式及在其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不同范式之间的起承转合，找出媒介制度形成和变迁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时性因果逻辑，从而弥补既有研究中“没有对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sup>[12]</sup>的问题；在静态层面上，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分析，比较分析的焦点不能过于狭隘，对于媒介体制比较分析的变量也不能过度简单化，对模式的总结和理论的建设需要在个案的复杂性和模式的普适性之间寻找平衡，不能为了总结出普遍性、抽象化的模式，而抹杀特殊性和偏差，既要有对特定模式内部的差异有所考量，也需要充分观察媒介体制历时性的变化。

新旧媒体技术逻辑之间的冲突，新闻业整体遭遇的危机，亟需新闻改革。而新闻改革如果需要突破旧有的改革困境，需要媒介体制有所突破。而媒介制度变迁是在资本全球化和以互联网技术快速扩张为主体的国际背景下，融合资源、利益、关系、功能等多种要素的重新分配条件下进行的。在多种因素和力量的博弈下，媒介体制的影响因子日渐复杂多变，媒介体制的变迁将突破传统的政治主导框架，成为多种利益集团博弈的诱致性变迁，因此对媒介体制的研究需要结合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公共利益逻辑、技术逻辑等多种要素来探讨。<sup>[22]</sup>在多种利益成分、社会群体、社会力量、社会意志的混合中分

析其“文化内核”。

### 参考文献:

- [1] 潘忠党. 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7 (3).
- [2] 赵润森. 浅析媒介体制比较研究的框架设计和技术逻辑 [J]. 今传媒, 2016 (9).
- [3] [美] 丹尼尔·哈林, 保罗·曼奇尼. 比较媒介体制: 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 [M]. 展江, 陈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4.
- [4] Hardy, J. (2010). *Western media systems*. London: Routledge.
- [5] Hachten, W. A. (1981). *The World News Prism: Changing Media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lashing Ideologies*. Ames: The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6] McQuail, D. (1987).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7] Sparks C, Splichal S. (1989). Journalistic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socialisation: summary of a survey study in 22 countries. *Gazette (Leiden, Netherlands)*, 43 (1): 31-52.
- [8] Dobek-Ostrowska, B., & Głowacki, M. (2010). *Comparative media systems: Europe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Budapest, Hungar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9] Uce, V., & De Swert, K. (2010). *Introducing Turkey to the three media system models: The content of TV news in eleven countries*. Budapest, Hungar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10] Dobek - Ostrowska, B., & Głowacki, M. (2010). *Comparative media systems: Europe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Budapest, Hungar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11] HELD, M., Dobрева, M., & Adolphsen, M. (2008).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and media content: Online newspapers in t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Global Mass Communication*, 1 (3/4), 165.
- [12] 李德刚. 历史制度主义: 媒介制度变迁研究的新范式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0 (2).
- [13] Huang C. (2003). Transitional media vs. normative theories: Schramm, Altschull, and Chin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 (3): 444-459.
- [14] Cardoso G. (2006). *The media in the network society: Browsing, news, filters and citizenship*. Lisboa, Portugal. CIES-Centre for Research and Studies in Sociology.
- [15] Thomass, B. (2007).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e Development of Analytical Tools and Theoretical Concepts over the Last 50 Years. In Dobek-Ostrowska, B., & Głowacki, M. *Comparative media systems: Europe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pp. 11). Budapest, Hungar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16]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M]. 纳日碧力戈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1-22.
- [17] 潘祥辉.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机制研究——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D]. 浙江大学, 2008.
- [18] 李红涛. 全球媒介体制: 从规范讨论到比较研究 [J]. 中国传媒报告, 2012 (4).
- [19] 李金铨. 在地经验, 全球视野: 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 [J]. 开放时代, 2014 (2).
- [20] A. Giddens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21] Lijphart A.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3): 682-693.
- [22] 胡正荣, 李继东. 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 [J]. 新闻大学, 2005 (1).

[责任编辑: 赵晓兰]